

作为爱情悲剧和攻击型传奇作品的《霍小玉传》

方坚铭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32)

摘要:当代文史专家认为:《霍小玉传》是一部早期“牛李”党争产物。作者在此基础上,确定其创作时间为长庆四年二月前,同时进一步确定了蒋防此传的创作意图,即间接打击牛党,美化李党。论述了本传中两大层次的对比:一是以霍小玉的挚情与李益的薄情作对比,二是以李益作为进士的浮浪、薄幸与山东士族的礼法、恩义、豪侠作对比,这两种对比奠定了本传之为爱情悲剧经典和“攻击型”传奇作品。

关键词:《霍小玉传》;爱情悲剧经典;“攻击型”传奇作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6-0797-05

《霍小玉传》并非仅仅是一篇凄美的爱情悲剧小说。经当代文史专家如卞孝萱^[1]、王梦鸥^[2]、傅锡壬^[3]诸先生发覆,此文为早期党争产物。诸文史专家考证思路不外二种,一者,自本传的结构、布局而致诸疑,由文本之破绽入手探究作者之本意。二者,自作者蒋防与被攻击者李益各自的人际关系进行考察,得出蒋防与李绅、元稹善,属于李党,李益与令狐楚善,属于牛党。在这些文史专家考辨的基础上,笔者的着眼点和兴趣是从文本入手,进一步阐发其作为爱情悲剧经典和“攻击型”传奇作品的重要特征。

一、《霍小玉传》的创作时间和创作意图

(一) 《霍小玉传》当作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二月前

卞孝萱先生认为此文作于长庆初年,傅锡壬先生则认为作于大和六、七年李德裕入相之时。本文比较认同卞孝萱先生以本传作于长庆初的看法,又小有修正。今简单论之:1)元和末长庆初为李逢吉之党、令狐楚与裴度、李绅等李党成员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从长庆年间权力动态分布的角度看,虽然李逢吉之党和令狐楚等人在这段时间内得势,然李党党魁亦非束手就缚者。长庆初元稹一度入相,而裴度亦元勋大臣,李绅作为翰林学士亦为穆宗所宠幸。在长庆四年二月李绅被贬端州,蒋防亦随之被

贬为汀州刺史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蒋防完全有可能写作这样一篇传奇以攻击政敌。故不必论定在长庆初,亦不必论定在大和六、七年李德裕入相之时。2) 卞孝萱先生以为:元和末、长庆初,元稹、李绅乘令狐楚贬谪在外,李益孤立无援的时候,排挤李益,蒋防为文以攻击之。而且,还有一个理由是,长庆初元稹、李绅、蒋防三人同在朝,长庆二年六月,元稹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故当三人在一起的时候蒋防作此传的可能性最大。此说未免过于落实。因为党争为公开的、激烈的,蒋防既欲攻击牛党,何必待令狐楚贬谪之后方为之,亦何必待与李绅、元稹同在一起方为之?处于上风时固可攻击政敌,而处于下风时尤可借小说以泄恨,甚或挽回情面。3) 傅锡壬先生认为,本传当作于李益死后^①。笔者认为,既为攻击政敌之作,何必待李益死后方为之。《周秦行纪》《牛羊日历》等“攻击型”作品,皆当牛僧孺、杨虞卿在世,且权重之时为之。李益元和十五年任右散骑常侍,大和元年以礼部尚书致仕,并非重臣大僚。蒋防仗李党魁首之势力,欲攻击李益而间接攻击牛党,有何不可?且蒋防若于李益死后大和七、八年方为之,乃以晚年老境而为此等风月之作,有之乎?

(二) 蒋防的创作意图

蒋防跟李绅有着亲密的关系^②,属于李党成员。这篇作于长庆四年之前的传奇,跟当时的党争动态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在早期党争史中,即元和末

长庆宝历年间,以李逢吉之党与令狐楚、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党派组合一个普泛的同盟,与以裴度、李德裕为首的党派之间展开斗争。这时候政争的焦点往往围绕着淮西用兵之争和相位之争。这段时间也是变故屡兴、闹剧纷纭的时期。穆宗即位,时李绅、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号为“三俊”。三人才力相当,政治观点比较接近,又同在翰林,故为李逢吉之党所忌;元稹为令狐楚草衡州制,极尽诋毁之词;而李逢吉之党费尽心机倾轧裴度、李绅等,发生了于方案、谋立深王案等;长庆元年发生了牛李党争史上具有标划党派界限意义的科场案,二年发生了牛李二大党魁的相位之争。以传奇作品为攻讦之工具,以牛党非核心人物李益为靶子,间接打击牛党,同时美化李党,是很有可能的。这也是蒋防创作本传的一大意图,也是我们理解本传的一个切入口。

蒋防为什么会选择写李益,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还没有史料说明蒋防与李益之间有个人恩怨,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使他写这篇丑化李益的作品。一般的说法也是以李益属于牛党,蒋防属于李党,故蒋防在元稹、李绅的授意之下,以李益为靶子写出这部作品^[1]。

尽管不排除这种李党魁首授意蒋防写作的可能性,但是像《霍小玉传》这种优秀的文艺作品,仅仅认为是秉承某种意旨而作未免简单化。这部作品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既来自于某种灵感的激发,又是一定的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同时作者在行文中精心地安排自己的主观意图。由于作者具有高超的文学技巧,从而使作品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意蕴,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

笔者认为,李益的猜忌事迹可能是激发蒋防创作《霍小玉传》的重要因素,而唐代士人与娼妓经常发生的悲剧爱情故事,又为蒋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李益的猜忌事迹,在蒋防写这篇传奇之前,当为众所周知。《新唐书》卷203(《旧唐书》卷137)载:“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甚严,世谓妒为李益疾。”

在本传结尾,作者用了一大段的文字来描写李益受到霍小玉冤魂的报复,成了一个“心怀疑恶,猜忌万端”的人。这段作为文章结果的内容,在实际创作中可能是作者创作的激发因素和出发点。也就是说,作者其实是拿李益的猜忌作文章,为其之所以猜忌安排了一个原因,即李益的负情负心。而这个原因的铺陈,则成了一段凄婉感伤的爱情悲剧故事。

单从艺术角度和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最后

那一段纯粹是画蛇添足,或可称之为败笔。这段写悲剧爱情故事之“果”的文字,在作者的意识中,却是不可或缺的。如前所述,甚至可能是作者创作的起点和激发因素。同时,也规定了前面一大段悲剧爱情故事的基调,即使前面一大段为“因”的文字,在文字的运行过程中,将种种意思和头绪汇集在一起,犹如条条河流一样,归向这个最后的“果”。

二、作为爱情悲剧经典的《霍小玉传》

以霍小玉的挚情与李益的薄情作对比,这种对比奠定了本传之为爱情悲剧经典的基础。霍小玉之所以心许李益,是因为早知李益的名字,平时就爱念其“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之句。而李益初次见霍小玉,回复她的“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之语,则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正是他的情爱观的直白。霍小玉爱慕李益之才,而李益不过贪图霍小玉之貌,从而酿就了这起爱情悲剧。

李益与霍小玉初次欢会之时,李益便轻许誓约:“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褰幄执烛,授生笔研。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研,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毕,命藏于宝篋之内。”可见,霍小玉既知己为娼妓身份,非“门族清华”、进士出身的李益之匹,亦知李益对自己是一种“色爱”,故虽初夜缠绵,而发此等乐极生悲之语。而李益本为重色者,他的轻许誓约,不过骗取霍小玉的芳心而已。

霍李相守二年后的春季,“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

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小，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霍小玉的“短愿”可谓极凄惨之语。其所求者，不过希望能在短期内（八年）获得李益的爱情，以其一生为押注。揆之当时社会风俗，当时士子虽无可能与娼妓结成姻亲，故元稹之于崔莺莺始乱终弃，乃为时人所认可。然霍小玉之短愿，要求并非太过，若是有心的男子，要做到也不是不可能。李益又一次脱口而出，轻许誓约，并许以“八月之约”，而终弃之蔑如，以其仅为一种“色爱”，本不存与之偕老之念也。

李益别霍小玉后，马上负约了。其原因，是为了与表妹卢氏结婚。为求筹备聘财，“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而八月之约早已成空，且有意避开霍小玉，不通消息。“生自以孤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

而霍小玉却一往情深，欲求一见李益，以至于身染沈疾。“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虚词诡说，日日不同。博求师巫，遍询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篋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

李益入长安欲就婚卢氏，也是刻意躲开霍小玉，即或在知晓霍小玉“疾候沈绵”后，依旧如此，益显其人之刻薄寡恩，“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沉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可见他当时已下决心攀结高门，蔑弃小玉。

霍小玉之短愿既不就，最后连见李益一面都几不可能。后在黄衫丈夫的帮助之下，终于见到了李益一面，饮恨而终。而此时的霍小玉，满腔爱意，已为怨愤所填满。故最后一番话，即是她的极伤心、极怨愤之言。文云：“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观李益在霍小玉死后之表现，可谓尚有“余情”（霍小玉冤魂评李益语）者。作者安排这一段，是要

令李益知愧，感哀，以显霍小玉之真情，皎然不可夺者，同时益显李益之可悲，终其一生，不懂珍惜霍小玉之挚情也。

李益经此一番遭遇之后，转成一猜忌成性之人，对妻妾、侍婢媵妾、名姬，皆横加猜忌，刻意提防。此其恶果报也。故霍小玉与李益互为因果。始者，李益令霍小玉备尝爱情之悲哀，终者，霍小玉之冤魂令李益常现猜忌之丑态。

何以言这种对比奠定了本传之为爱情悲剧经典？首先，由于以这种强烈的、鲜明的对比贯穿于全文始终，使本传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深度，情感的冷热轻重、情节的变化曲折、期冀与冷淡、希望与失望，均杂糅在这种富于张力的对比之中。且故事情节由前部分的轻缓向后部分的急促过渡，不但使原本简单的故事情节产生一种摇曳多姿、变化多端之美，而且也形成了一种情感的梯度，即由前部分的清丽婉转入后部分的凄厉悲楚，从而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其次，这种对比同时也是情节发展、内在情感变化的驱动力。当霍小玉的钟情与李益的薄情之色差愈加明显的时候，故事也被推向高潮，即霍小玉痛斥李益并气绝身亡。最后，这种对比是丰腴的对比，而不是干瘪的对比。每一次的对比，都是在一种“氛围”中进行的，那些明丽清新的刻划，那些哀婉伤心的对话，那些沉重而悲凄的场面，往往营造成一种凄婉、凝重、深沉的氛围，产生丰富的情韵，从而颇具艺术感染力。整篇传奇的行文运笔体现了作者高超而独到的艺术才华，从而使本传辐射出幽幽而弥漫的光亮。明胡应麟云：“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采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4]

三、作为“攻击型”传奇作品的《霍小玉传》

以李益作为进士的浮浪、薄幸与山东士族的礼法、恩义、豪侠作对比，这种对比奠定了本传之为“攻击型”文学作品的基础。所谓“攻击型”文学作品，是本人自拟的一词，用来指称党争过程中出现的、以政敌为攻击目标的、具有攻讦、诽谤作用的文学作品。唐代党争过程最早出现的攻击型文学作品，或许是柳郢作的《上清传》，这是贞元年间窦参与陆贽之争的产物，柳郢欲借此以攻击陆贽及其门生。及牛李党争渐兴，以攻击政敌为目的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多起来。这种攻击型文学作品，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

形态是传奇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具有复杂性、层深性,且往往以爱情小说的面目出现,非深入探析不能明其本旨,其尤著者有《霍小玉传》《李娃传》等。然亦有攻讦、诽谤政敌,略无避嫌者,如署名为牛僧孺实则为李党成员韦 M 所著的《周秦行纪》^⑤,即直接攻击牛僧孺也。其他还有《大水辨》《真珠叙录》等。另一种形态,是指其他体裁的作品,如笔记体,则有《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等;议论体,则有《周秦行纪论》等^[5]。

唐代士族出身、以礼法自持者,自是鄙薄进士浮浪之风习,此屡见于李党魁首之言论。《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载:“是时,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又《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会昌四年十二月条载:“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

陈寅恪先生论党派分野云:“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进统治阶级也。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弟子逞才放浪之习气不能改易也。”^[6]牛李两派分野大致不出先生此论之范围,本传李益进士浮浪风习与山东士族风标之对比亦可据先生之论以阐发之。

蒋防既与李绅亲善,属于李党,则李党的这种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自是接受的。且本文之主观意图既为攻击牛党所作,故在本传中,处处透露出其贬斥李益的进士浮浪风习,赞赏山东士族或亲近李党者的礼法、恩义、豪侠的消息。以这种对比之故,奠定了本传之为“攻击型”文学作品的基础。

好色可谓是进士浮浪风习的一大重要表现。本传对李益的“好色”重加渲染,这也是党争中“攻击型”文学作品常用的惯伎。李益“每自矜风调,思得

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托媒于鲍十一娘。“常受生诚托厚贿,意颇德之。”初闻鲍十一娘介绍霍小玉,“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悛。’”又其情爱宣言云:“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其人为色所役,可知矣。正是因为为色所役,所以能“诚托厚赂”鲍十一娘以求美人,所以能轻许誓约,以骗取霍小玉之芳心,所以又能弃绝霍小玉,略无惭愧。

攀附高门,以求腾达,亦是进士浮浪风习的一大表现。李益本与霍小玉为八月之约,其母为其婚约表妹卢氏,可谓门当户对。“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李益对此婚事可谓非常积极。“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为筹足聘财而费尽心机。像李益这种情况,正合乎陈寅恪先生所讲,“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李益出身于陇西李氏,“家素贫”,为衰落的士族,而攀附山东甲族卢氏,无疑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说不尽的好处,此又为众所知也。

同时,在本传中,蒋防安排了崔允明、韦夏卿、黄衫丈夫等好几个山东士族出身,或者亲善李党的人物,以他们的礼法、恩义、豪侠,来衬托李益这个进士浮浪子弟的丑陋形象。

总之,《霍小玉传》并不仅仅是爱情悲剧经典,也不仅仅是党争过程中产生的“攻击型”传奇作品,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将这两方面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传奇小说。当我们透析作者创作思路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他的“机心”,他的创作意图,即间接打击牛党、美化李党。一方面,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环境的刻划,巩固了他的创作意图,使他更加有效地攻击政敌,达到了应有的效果^⑥。但是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自律原则,霍小玉爱情悲剧的深刻性,以及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使之远远地超越了党人攻击之作的浅薄、苍白,也超越了庸俗化的士人与娼妓的悲剧爱情故事,从而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 李益和蒋防为同时代人。李益,生于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卒于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蒋防,生年不详,卒于大和五年至开成元年间。

② 在蒋防青年时期,李绅曾即席命赋《鞞上鹰》。“荐之,后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咸淳毗陵志》卷16《人物·宜兴·唐》)。长庆年

间李绅受到李逢吉集团的排挤,他也受到了牵累。《旧唐书》卷17上《敬宗纪》云:“(长庆四年二月)癸未,贬户部侍郎李绅为端州司马。丙戌,贬……翰林学士、司封员外郎、知制造蒋防为汀州刺史,皆绅之引用者。”

③ 此据李剑国先生之说,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529-537页。

④ 卞孝萱先生认为:“长庆时,李益罢右散骑常侍,为太子宾客。李益仕途上的这一挫折,或与《霍小玉传》对他的攻击有关。”见《〈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一文,所论可参。

参考文献:

- [1] 卞孝萱.《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J]. 社会科学战线, 1986, (2): 274-279.
- [2] 王梦鸥. 霍小玉传之作者及故事背景[A]. 唐人小说研究二集[C].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73.
- [3] 傅锡壬. 蒋防霍小玉传的创作动机[A]. 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5. 217-233.
- [4] 汪辟疆. 霍小玉叙录[A]. 唐人小说[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82.
- [5] 李剑国.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 [6]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71.
- [1] 卞孝萱.《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J]. 社会科学

Romantic story of Huoxiaoyu: a blue romance classic and wrestling literature

FANG Jian-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Abstract: Experts think that *the romantic story of Huoxiaoyu* is the outcom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Niu and Li. The author presents that *the romantic story of Huoxiaoyu* should have been written before February of Changqing (A.C.824), whose author Jiangfang finished it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the Nius while to glorify the Lis. There are two lines in this story: the first was Huoxiaoyu's warmth and Liyi's coldness, the second was Liyi's unloyalty and the Shandong's loyalty. We can reach a conclusion that the story written by Jiangfang is not only a blue romance story but also a wrestling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Romantic Story of Huoxiaoyu*; a blue romance classic; a wrestling literature

[编辑:苏慧]